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及实现路径

任保平 宋雪纯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新发展理念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考量发现,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基础研究较为薄弱,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区域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国土利用空间布局不合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不合理的产业转移给生态环境带来负担;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我国带来了较大的贸易压力,而我国对外贸易相关制度尚未与新的开放格局相匹配;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等问题突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现路径在于进一步激发创新发展活力,加强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推进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建设,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结构性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685(2020)06-0045-10

DOI: 10.16528/j.cnki.22-1054/f.202006045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基于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变化,以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做出的重大判断。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是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从新发展理念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分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并基于此找准下一步发展路径。

一、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快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考量发现,经济发展呈现新趋势,这决定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 创新发展维度: 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有所提升

新世纪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培育创新人才,提高经济发展的创新贡献率,创新发展取得了较大进步。党的十八大做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部署,此后创新产出效果明显,参与科研创新的企业增

作者简介: 任保平,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宋雪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8VXK002)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研究”(编号:19FJLB011)的成果。

多,在创新驱动、创新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创新指数达 212,第一次突破 200 大关,增幅为 8.6%,是自 2005 年测算以来的最高值。

1. 科研产出数量不断提高。2003—2018 年,我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从最初的 0.21 件增加至 11.5 件,科研产出数量迅速攀升。(见图 1) 2018 年我国的创新产出指数^①为 264.1,同比上涨 11.7%。2019 年国内有效专利发明拥有量高达 186.2 万件,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 途径提交专利申请 5.9 万件,居世界首位。2020 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数据显示,2015—2019 年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高质量科研产出增加了 63.5%,成为增长最快的国家,更有 17 家中国科研机构进入全球百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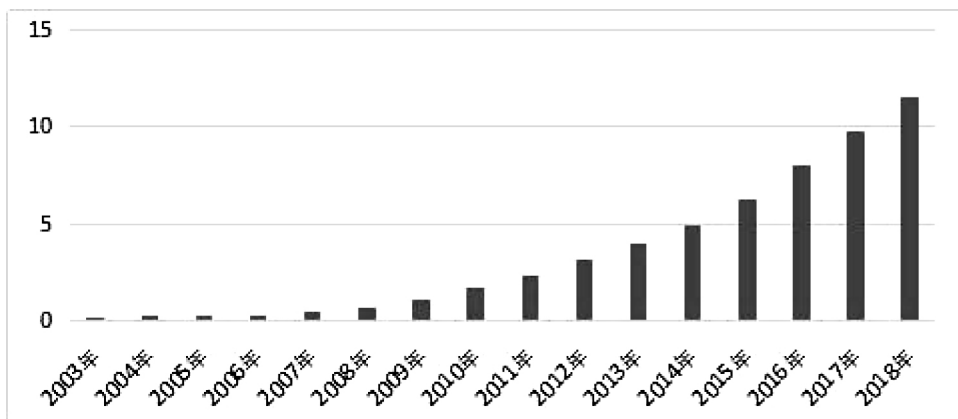


图 1 2003—2018 年我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单位:件)

数据来源: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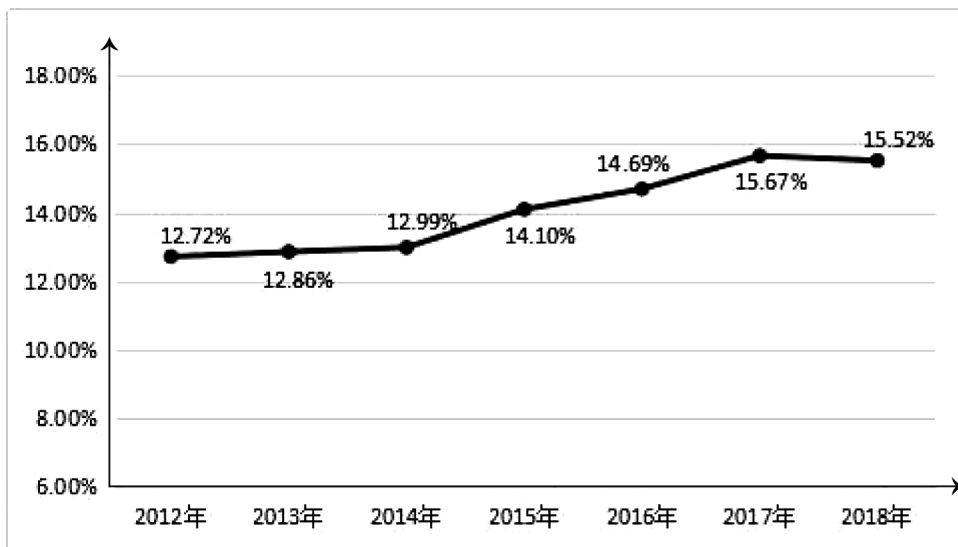


图 2 2012—2018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规模以上企业比重

数据来源:2013—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2.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总体呈上升态势。高新技术产业业务收入所占比重稳步上升,从 2012 年的 12.72% 增至 2018 年的 15.52%,总体呈上升态势。(见图 2) 高科技产业创新成效显著,2018 年创新成效指数^②增至 164.1,同比上涨 4%。2019 年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中,我国占据 227 个席位,其中,神

① 创新产出指数包括每万人科技论文数、每万名 R&D 人员专利授权数、发明专利授权数占专利授权数的比重、每百家企业商标拥有量、每万名科技活动人员技术市场成交额五个指标。

② 创新成效指数包括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货物出口额的比重、单位 GDP 能耗、人均主营业务收入、科技进步贡献率五个指标。

威·太湖之光位居第三位,天河二号位居第四位。同时,我国在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制药、核应用技术等领域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如2019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占世界人工智能企业数的21.67%,居第二位;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首登全球50名药企榜,并保持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趋势,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实现跨越式发展。

3.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R&D经费占GDP的比重显著增加。多项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活动,良好的创新环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创新队伍中。2018年,进行R&D活动的企业占总企业数量的比重已达28%。同时,我国每万人高等教育学校数呈逐年增加趋势,为我国创新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为科研水平提升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撑。(见表1)近年来,我国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2018年创新投入指数^①增至194.1,同比上涨6%;2019年我国研发投入居全球第二位,18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百强。

表1 2003—2018年我国创新能力发展状况

年份	R&D占GDP年均比重(%)	R&D活动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年均比重(%)	每万人高等教育学校数(所)
2003—2007	1.2769	6.5413	0.0172
2008—2012	1.6995	9.5226	0.0203
2013—2018	2.0817	21.6321	0.0208

数据来源:根据200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二) 协调发展维度: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新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协调发展能力不断提升。^[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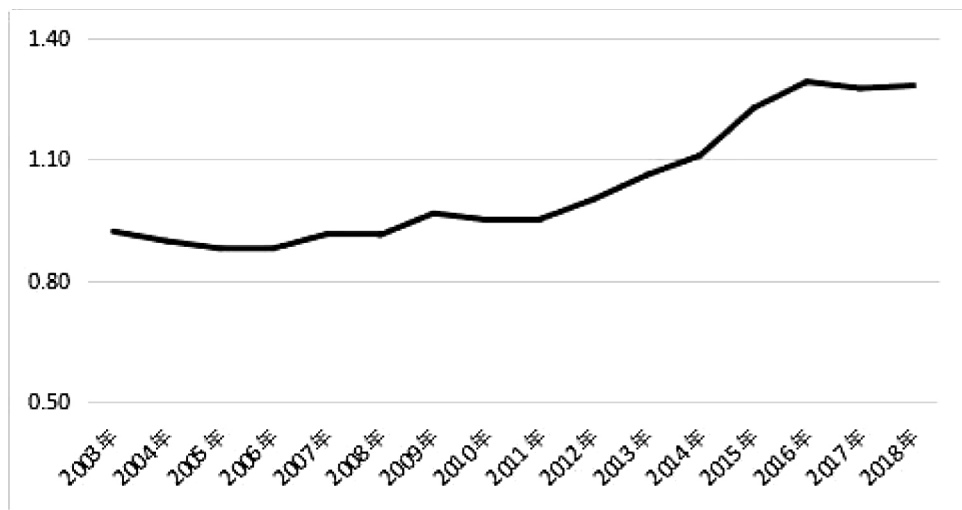


图3 2003—2018年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200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1.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03—2018年,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比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由2003年的0.9提升至2018年的1.28,(见图3)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升,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加大,提质增效效果显著。分区域看,我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②从2003—2007年的0.1618降至

^① 创新投入指数包括R&D经费占GDP比重、基础研究人均经费、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所占比重五个指标。

^② 通过整理分析2003—2018年的相关数据获得东、中、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并将泰尔指数的倒数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收入越平均,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越小。

2013—2018 年的 0.1008;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从 2003—2007 年的 0.2630 降至 2013—2018 年的 0.2074;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从 2003—2007 年的 0.3801 降至 2013—2018 年的 0.3307。但对比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发现, 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高, 西部地区的合理化程度明显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虽然各地区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但总体上我国产业结构呈不断合理化的趋势, 并且我国工业正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近年来,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 服务业产值持续攀升。2019 年,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 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 53.9%。

表 2 2003—2018 年中、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

	2003—2007 年平均值	2008—2012 年平均值	2013—2018 年平均值
东部地区	0.1618	0.1454	0.1008
中部地区	0.2630	0.2386	0.2074
西部地区	0.3801	0.3719	0.3307

2.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03—2009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维持在 3 以上的较高水平。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 不断加大城乡民生保障力度,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各地深入推进扶贫工作,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收入差距指数下降趋势明显, 从 2010 年的 2.99 降至 2018 年的 2.69。(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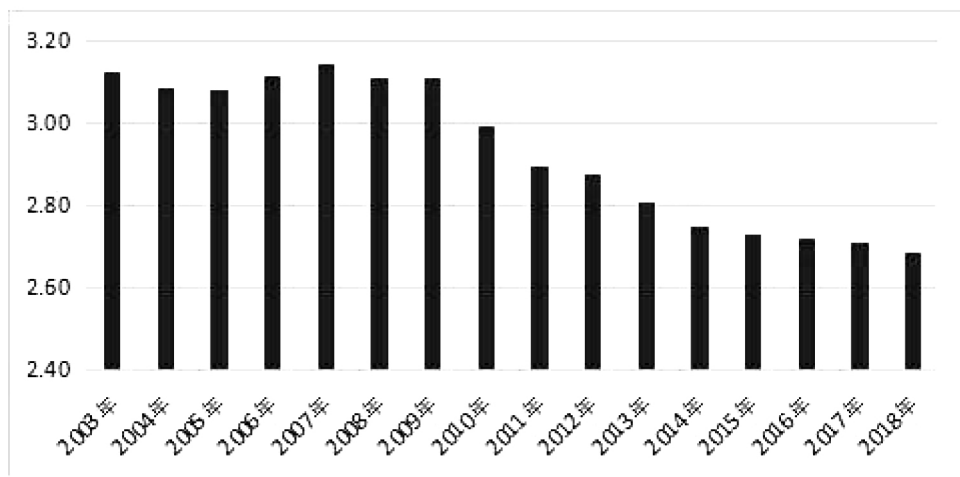


图 4 2003—2018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数据来源: 根据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3. 产业结构偏离度不断优化, 生产效率逐渐提高。^① 2003—2018 年, 三大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匹配度总体呈持续优化趋势, 向均衡方向发展。但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并未出现显著改善, 长期保持负值, 说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尚未全部释放。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是三大产业中最高的, 说明其劳动生产率较高,^[3] 且存在较大的就业空间。(见图 5) 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呈逐年减小趋势, 是因为其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且生产效率较高。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吸收就业的能力大幅提高。

(三) 绿色发展维度: 空气质量改善, 环境保护水平整体提升

新世纪以来, 我国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 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九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这一时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

^① 产业结构偏离度 $P_n = (Y_n/L_n) - 1$, 其中, Y_n 代表第 n 产业产值比重, L_n 代表第 n 产业就业比重。 P_n 绝对值越小, 说明结构越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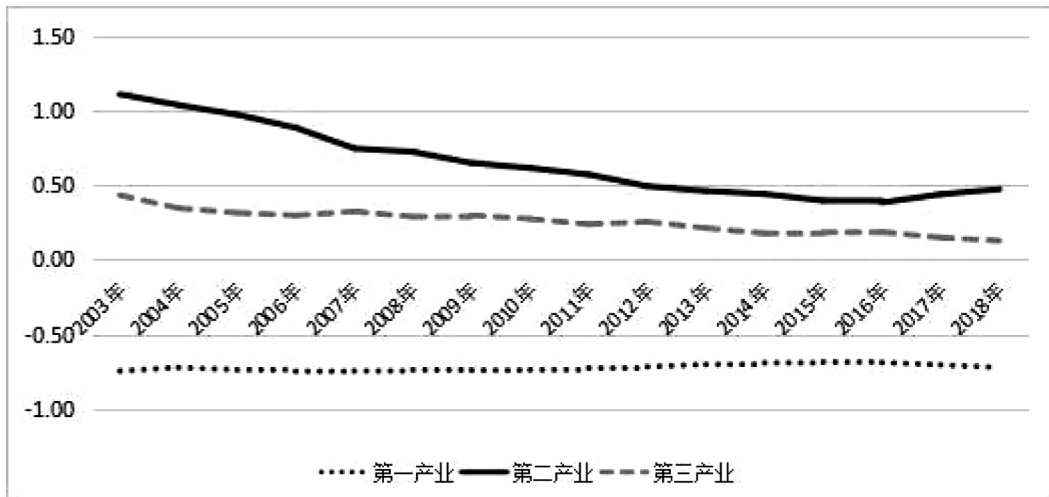


图 5 2003—2018 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

数据来源: 根据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1. 空气质量有所改善。2003—2012 年, 全国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及优于二级的平均天数一直在 250 天以上, 特别是 2005—2012 年平均天数可以达到 300 天以上。2013 年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对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的行业严加管理, 加之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2018 年空气质量达到及优于二级的平均天数升至 265 天。

从 2014—2018 年 PM_{2.5} 的数值来看, 处于极高浓度和高浓度^①的城市个数逐渐减少, 极高浓度的城市个数现已降至零, 处于较低浓度和微高浓度的城市个数逐渐增多。(见表 3) 说明我国近几年空气治理已经显现成效, 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表 3 2014—2018 年我国环保重点城市 PM_{2.5} 浓度值划分情况

年份	城市数量(个)					
	>100 $\mu\text{g}/\text{m}^3$	70~100 $\mu\text{g}/\text{m}^3$	50~70 $\mu\text{g}/\text{m}^3$	35~50 $\mu\text{g}/\text{m}^3$	15~35 $\mu\text{g}/\text{m}^3$	<15 $\mu\text{g}/\text{m}^3$
2014	4	36	46	18	9	0
2015	1	24	52	20	16	0
2016	0	21	37	38	17	0
2017	0	10	39	43	21	0
2018	0	2	34	48	29	0

数据来源: 根据 2015—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2013 年及以前环保重点城市仅涉及 51 个城市, 2014 年及以后增加至 113 个城市。

2. 环境保护水平整体提升。近年来, 煤改气、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环保政策相继出台并有序推进, 使全国整体环境有所改善。^[4] 2018 年,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9%, 污水处理率达 94.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处理率均大幅提升。随着民众对宜居环境要求的提高, 城市绿化覆盖率整体处于增长态势。(见图 6) 总体看环境水平整体处于不断改善的趋势, 向高质发展、绿色发展的方向稳步迈进。

(四) 开放发展维度: 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进

新世纪以来, 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与各国建立双边及多边合作, 推动各领域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1. 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我国持续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秉持互利共

^① 将 PM_{2.5} 年均浓度值由低到高划分为 6 种类型: 极低浓度 (<15 $\mu\text{g}/\text{m}^3$)、较低浓度 (15~35 $\mu\text{g}/\text{m}^3$)、微高浓度 (35~50 $\mu\text{g}/\text{m}^3$)、较高浓度 (50~70 $\mu\text{g}/\text{m}^3$)、高浓度 (70~100 $\mu\text{g}/\text{m}^3$) 和极高浓度 (>100 $\mu\text{g}/\text{m}^3$)。

赢的原则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沟通与合作,向实现开放型经济强国的目标逐步迈进。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整体需求放缓,国际贸易形势日趋激烈,使我国外贸面临较大挑战,但我们通过扩大开放市场、建设自贸区、“一带一路”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5] 2003—2018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①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 7) 2003—2011 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速较快,2012 年后 FDI 增速放缓,特别是 2015 年达到 1200 亿美元后,基本保持平稳,没有较大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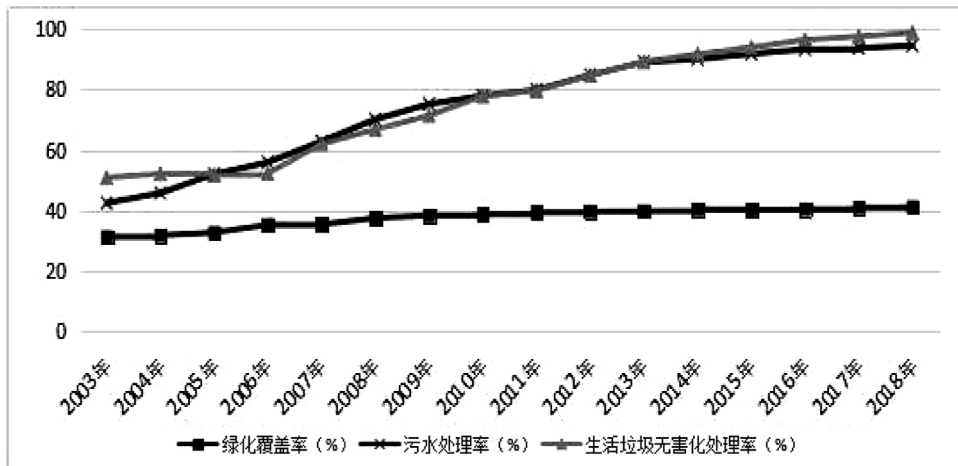


图 6 2003—2018 年我国绿色环境水平变化

数据来源: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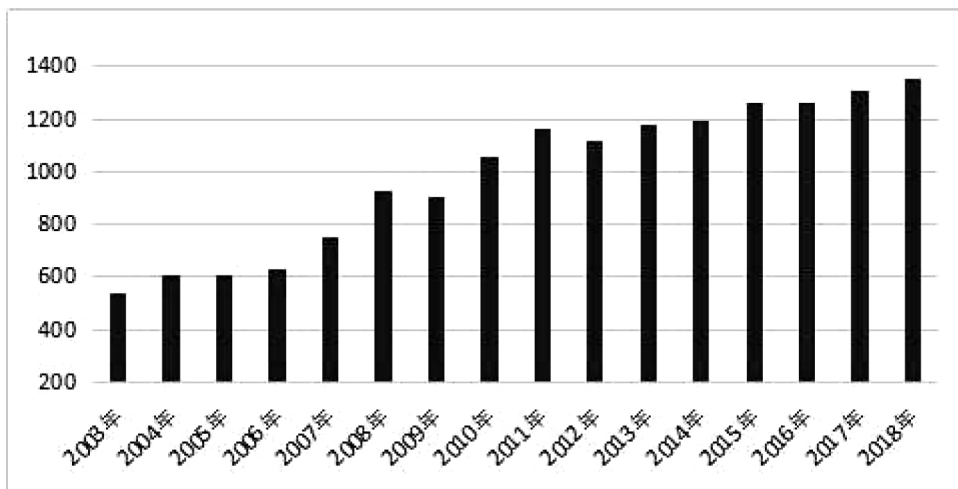


图 7 2003—2018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变动趋势(单位: 亿美元)

数据来源: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2. 国际旅游收入增加。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2003—2018 年我国国际旅游收入整体呈上升趋势,2003—2013 年增速较小,总体保持稳中有升,2014 年国际旅游收入大幅增长至 105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2014—2018 年国际旅游收入稳步增长。(见图 8)

(五) 共享发展维度: 扶贫成效显著,医疗资源供给增加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加大

① 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FDI)表示对外开放程度。

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保证改革成果惠及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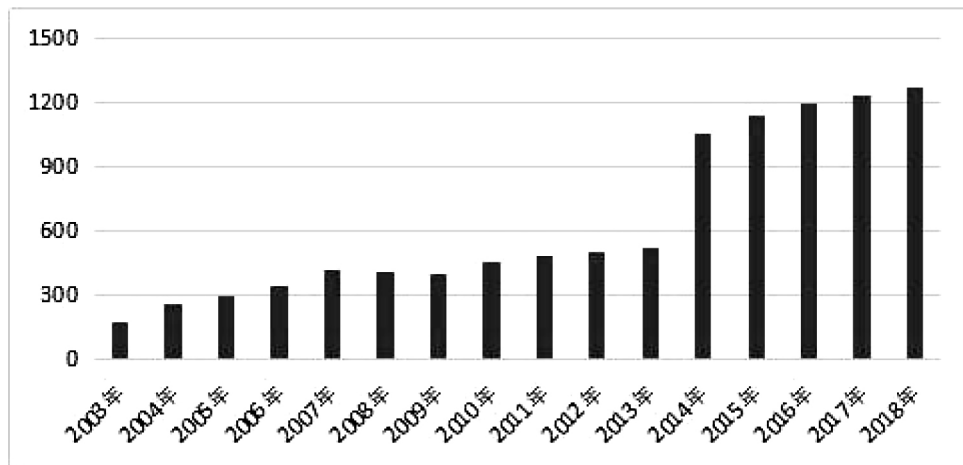


图8 2003—2018年国际旅游收入变化趋势(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200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1. 扶贫成效显著。2013—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到1660万人,每年减贫人数保持在1200万人以上,832个贫困县已脱贫摘帽,436个。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且降幅明显,从2000年的49.8%降至2018年的1.7%。中央及地方政府通过精准扶贫、长期扶贫,使贫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见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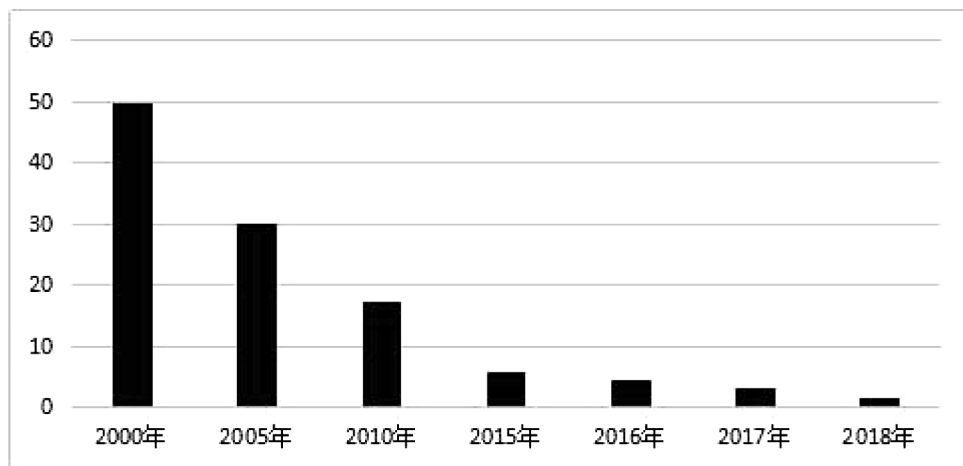


图9 2000—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

资料来源:2001—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2. 医疗资源供给增加。自2003年起,千人病床数逐年增加,由2003年的2.4张增至2018年的6.03张,医疗资源供给增加。新农合等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和进一步完善,让更多的人看得起病,使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实现医疗资源最大限度共享。

二、新发展理念目标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维度分析,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展方向,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一) 创新发展维度的制约因素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创新维度看,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不断加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逐步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是我国创新发展仍以各级政府及国企为主导,市场及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贡献相对较小。虽然政府对创新的政策性鼓励持续加大,

创新的外部环境不断改善,但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远远不足,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求不相适应。同时,我国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缺乏关键性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虽然我国科技人才供给量庞大,但高端创新人才不足,人均创新产出效率不高,这些均对我国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制约。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且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尚不完善,对创新成果保护力度不够。民营企业多倾向于研发时间短、成效快的项目,这与产权保护不足有着必然联系,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创新质量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三是我国基础研究较为薄弱,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在创新动力和原始创新能力上也有所欠缺,这些都对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二) 协调发展维度的制约因素

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从协调维度看,随着科技的发展,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也不再局限于自然因素、区位因素等短期难以改变的客观因素,还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等因素。近年来,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已从过去GDP等指标数量上的差距转变为发展潜力、发展能力等质量上的差距。而且中部和西部地区受虹吸效应影响,支撑产业智能化发展的要素供给不足,导致高新产业发展受阻,难以培育新动能,致使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持续扩大。另外,长久以来,我国国土利用空间布局不太合理,以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愈发严重,阻碍区域经济发展。虽然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收敛趋势,但差距依然较大,由于城乡间各资源要素占有比例不同,农业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以及城乡经济结构和资源要素利用率存在固有差异,使促进城乡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的难度加大,这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 绿色发展维度的制约因素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绿色发展维度主要是从生态环境角度出发,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公共性的特征,经济主体对于环境开发和使用的保护意识及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还不到位。一方面,受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污染日益严重;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生活垃圾等污染不断加重,治理成本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国内外区域间不合理的产业转移也给生态环境带来负担,发达国家将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将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使产业承接地区的环境污染愈发严重。同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也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四) 开放发展维度的制约因素

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高水平的开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给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更高层次的挑战和风险。一方面,当前国际竞争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各国对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争夺激烈。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西方国家的干扰给我国带来了较大的贸易压力。全球资本竞争激烈,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传统优势逐渐减小,多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我国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构成开放角度对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我国对外贸易相关的金融体制、法律制度、人才管理制度等与新的开放格局还不相匹配,难以支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

(五) 共享发展维度的制约因素

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近年来,我国在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等问题。相关法律制度、政策体系不完善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共享发展。如,由于收入与分配制度不完善,使得尚未全面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由于政府社会保障供给职能发挥不充分,使得我国尚未全面实现城乡间、区域间公共服务共享,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民生问题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新发

展理念贯穿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一) 激发创新发展活力

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关键领域的科技研究,培育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先企业。拓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资金来源渠道,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加强产权保护力度,为创新成果提供保障。引进高端创新人才,优化人才服务,完善创新激励体制机制,激发技术人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大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提高我国科技的原始创新能力,掌握科技竞争的主动权。深化人工智能、数字化、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的应用领域,大力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双创带头作用。

(二) 加强协调发展的整体性

针对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采取分类措施,持续推进区域发展战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抓住“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发挥地区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形成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带动全国其他地区,加强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打造城乡联动机制,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完善保障体系,扩大保障覆盖领域和范围,夯实我国经济发展根基,补齐“三农”短板。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加强市场机制建设,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三) 推进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建设

加大生态治理和补偿力度,对于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逐步淘汰,全面实行节能减排,促进绿色清洁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增加产业绿色科技投入,对相关产业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加快实现产业升级。建立和完善实行绿色生产及绿色消费的体制机制,加强政策引导,以实现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加快绿色科技创新进程,实现网络化、智能化治理污染,提高治理效率和质量,加快绿色能源体系的建设步伐。^[6]继续推进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发挥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树立绿色消费理念,提高国民对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培养国民生态保护意识。在全国推行节能环保活动,形成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良好风气。加快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实现管理标准化、法治化,为绿色发展提供更高层次的制度保障。

(四) 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健全对外开放的新机制,增强政策支持力度,扩大内陆地区开放,形成我国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改善投资环境,放宽投资市场准入标准,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扩大投资的主体范围,吸引外资注入。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进一步加快自贸区建设,探索自贸港建设,开拓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区域。通过构建开放新体制、形成开放新格局,为高质量开放型经济注入新活力。建立与我国开放新格局相匹配的人才管理体制、金融监管机制、法律制度等,促进相关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对外营商环境建设,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发展,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7]

(五) 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以人民的利益为发展要求,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实现服务共享和均等化;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推行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加大城乡医疗卫生保障力度,提高基础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建立和完善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形成制度化保障,更好地保障民生。推进脱贫攻坚进程,巩固已有成果,确保如期完成既定目标。创新社会治理,注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建构社区治理新格局,为社会稳定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有力保障。^[8]

参考文献:

- [1]张 磊.关系全局的重大判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论述[N].经济日报,2017-06-23.

- [2]白永秀,任保平.未来 30 年改革的主题判断和路径选择[J].改革,2010(1):20-25.
- [3]洪勇,李峰.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开放共享[J].先锋,2018(8):13-15.
- [4]马凯.构建产业新体系(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N].人民日报,2015-11-10.
- [5]程莉,周宗社.结构偏差、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经纬,2014(1):20-25.
- [6]任保平,李梦欣.中国特色绿色发展道路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实现的路径选择[J].经济问题,2019(10):32-38+120.
- [7]任保平,赵通.新时代我国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挑战与路径[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5):5-13+12.
- [8]任保平,李禹墨.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05-113.

(责任编辑:金光敏)

The Judgment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Ren Bao-ping, Song Xue-chun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Schoo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Abstract: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a stage of rapi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include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ai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e reflected in the lack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eak basic research, and insufficient depth and breadth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is widening, the layout of land use space is unreasonable;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s brought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transfer has imposed a burden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verse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rade protectionism have brought greater trade pressure to my country, and my country's foreign trade-related systems have not yet matched the new opening pattern; public service supply imbalances and other issues are prominent. The wa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lies in further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ity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en development system, forming a new pattern of high-leve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enhancing public service supply capabilitie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Structural problems; Modernized Economy

经济学人

马学军题



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等十余项，发表论文及专著逾二百篇（部），有多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教授，山东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和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出版《产权经济学导论》《语言经济学导论》等著作，发表论文四百余篇。先后获得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



任保平：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和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项，出版专著十余部。

戴翔：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无锡太湖学院商学院特聘教授。在核心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10余项目。曾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四届刘诗白经济学奖、商务部发展研究成果奖等多个奖项。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中央和省部级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333工程”中青年领军人才等计划。

